

古籍研究

GUJI YANJIU GUJI YANJIU

2006·卷上 (总第 49 期)

不遺狠錫
宸旨特令
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
校肆尚虞舛誤干冒
宸展伏增惶越慶曆四年二月二
十四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
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
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
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捌

安徽大学出版社

本刊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指导

古 籍 研 究

2006·卷上(总第49期)

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庆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

主 办



安 徽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程(CIP)数据

古籍研究. 2006 卷上/陶新民主编. -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6

ISBN 7-81110-147-5

I. 古… II. 陶… III. 古籍-研究-中国-丛刊 IV. G25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665 号

古籍研究 2006·卷上(总第 49 期)

编 辑 《古籍研究》编辑部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政编码 230039
电话传真 0551-5108241(总编室)
0551-5107784(发行部)
电子信箱 ahdxcchps@mail.hf.ah.cn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16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ISBN7-81110-147-5/K·9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退换。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傅璇琮 邓绍基 贾文昭 严云绶 余恕诚

主 编 陶新民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副 主 编 丁 放 纪健生 孙维城 胡益民 诸伟奇

编 委 丁 放 牛继清 纪健生 孙维城 赵应铎

胡传志 胡益民 徐凌云 郭全芝 诸伟奇

陶新民

执行主编 丁 放

告 读 者

《古籍研究》自1986年创刊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仁大力支持,成为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颇受欢迎的学术园地,刊载了大量学术品位高的文章。

由于本刊一直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现,许多读者与学人来信反映不易见到,需多方搜求方得一睹。因此,迫切希望本刊能公开出版发行。自2004年开始,本刊交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亦学界一幸事盛举矣。

本刊仍坚持一贯的办刊宗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反映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

公开出版后的《古籍研究》由原来的每年四期暂时改为每年上卷下卷两期。每期的容量在三十万字左右,两期相当于原来四期的容量。

欢迎相关刊物与本刊交换;欢迎读者订阅。

本刊欢迎广大学人惠赐下列稿件:

1. 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的理论探讨、方法论探讨和经验体会;
2. 有关目录、训诂、版本、校勘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3. 对历代作家、学者的思想、著作和流派的学术探讨;
4. 对重要典籍的评介;
5. 对古籍整理成果的评论;
6. 有关古籍和历代学者的珍贵资料(包括手稿、读书札记等,手稿可附照片)的辑录及考证;
7. 国内外整理、研究我国古籍的学术动态和资料介绍。

文稿以不超过8000字为宜(特约稿除外),一旦刊出,酌付稿酬;如半年内未被采用,可自行处理。

来稿请寄: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编辑部 邮编:230039

联系电话:0551-5107349 5107360

古籍研究编辑部

目 录

《三国志》标点商榷	张忠纲 (1)
《因话录》校勘标点举正	陶 敏 (3)
王逸《离骚经章句》语言的抒情风格及相关问题评述	王启敏 (8)
晋宋诗赋札记二则	冷卫国 (20)
新辑谢灵运《慧远碑》商兑	纪 贇 (23)
略论《中国佛寺志丛刊》之唐诗引文	李小荣 (30)
元稹诗集整理中的若干问题	王辉斌 (47)
敦煌道经 DX5425 号、S. 6002 号缀合与出处	叶贵良 (56)
《旧唐书·经籍志》子部脱漏书考证	牛继清 (60)
《王荆文公诗注》版本源流考	周焕卿 (68)
郑樵《校讎略》三题	伍媛媛 (75)
宋代著录《史记》初探	史明文 (84)
王韶行年考	王可喜 王兆鹏 (90)
甲骨文“𠂔”、“𠂔”二字补释	杨泽生 (104)
两周金文“亡”字用法初论	武振玉 (111)
上博馆藏楚竹书(四)释字二则	房振三 (118)
上博《诗论》之“文亡隐言”解	曹建国 (121)
论“幽”韵三等	余 璐 (128)
论《洪武正韵》的复合音系性质	王宝红 (134)

试析郑玄注释术语“之言”的来源	李玉平 (140)
论戴震《屈原赋注》的注释方法	徐道彬 (145)
唐代词调之别体及分体问题	谢桃坊 (157)
论陶潜诗文序	申东城 (170)
唐代诗歌的传播与音乐的关系	陶 涛 (175)
盛唐道士诗人吴筠考论	曲景毅 (183)
张籍病眼、罢官考辨	徐礼节 (194)
虚笔生花 妙语警世——浅论罗隐《谗书》的虚构艺术	邹春秀 (200)
张乔诗歌艺术风格探赜	宗顶侠 (211)
论宋初晚唐体诗歌的交际性	苏爱梅 (220)
柳永与贺铸词用典比较	肖 妍 (225)
继承与背离:黄庭坚“渔父家风”词阐释	刘 鹏 罗时进 (232)
苏轼《木兰花令》(霜余已失)创作时间新考	李景新 (240)
浙江诗画中的爱国情怀述略	程自信 (246)
周代女子的姓氏称谓	苗永立 (250)
汉代文献学与政治的关系	朱方琼 (255)
文献整理与创造——略谈朱子《大学》改本	陈良中 (263)
可贵的探索 无奈的追求——吴汝纶的西学思想及其矛盾	徐成志 (268)
精益求精——俞正燮校批《癸巳类稿》	于 石 (277)
《陶文图录》序	王恩田 (284)
黄仲则研究综述	张桂丽 (299)
先秦货币领域中的又一重要成果——谈《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	徐在国 (309)
今传戴叔伦集误收苏平诗补证	方孝玲 (311)

《三国志》标点商榷

张忠纲

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是集中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进行校点的。精选底本,参校善本,历时数年,可谓精审。但因二十四史所涉甚广,情况复杂,校点实属不易。智者千虑,或有一失。现仅就陈乃乾先生校点的《三国志》(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7月第2版)中偶而发现的几例自认为标点不妥的,条列于下,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1.《三国志·魏志·后妃传》:“明悼毛皇后,河内人也。黄初中,以选入东宫,明帝时为平原王,进御有宠,出人与同輿辇。及即帝位,以为贵嫔。太和元年,立为皇后。后父嘉,拜骑都尉……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明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蚩呆,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第一册167页)

按:《宋书·五行志三》云:“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南虞氏为妃。及即位,不以为后,更立典虞车工卒毛嘉女,是为悼皇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为妻之罚也。”(中华书局校点本1983年4月版第三册931页)《晋书·五行志上》亦云:“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南虞氏为妃。及即位,不以为后,更立典虞车工卒毛嘉女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为妻之罚也。”(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12月版第三册803页)《晋书》实照抄《宋书》,只删削三字。查《晋书·职官志》云:“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廐、骅骝廐、龙马廐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太仆,自元帝渡江之后或省或置。”又《宋书·礼志五》载:“水衡、典虞、牧官、典牧都尉……银印,青绶。五时朝服,武冠。”又云:“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国都尉、司马,铜印,墨绶。朝服,武冠。”是“典虞车工卒”,乃为典虞都尉、典虞丞等领导下的一个“卒”,地位极其卑微。据此,则《三国志·魏志·后妃传》引文后半应标作:“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明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蚩呆,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

2.《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大将军微闻其谋,请(李)丰相见,丰不知而往,即

杀之”注引《魏略》曰：“丰字安国，故卫尉李义子也……初，明帝在东宫，丰在文学中。及即尊位，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明帝问左右安国所在，左右以丰对。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邪？’后转骑都尉、给事中。”（第一册 301 页）

按：此段似应标作：“丰字安国，故卫尉李义子也……初，明帝在东宫，丰在文学中。及即尊位，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明帝问左右安国所在，左右以丰对。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邪？’后转骑都尉、给事中。”

3.《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注引《魏书》曰：“朗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自婚姻中表礼赞无所受。”（第二册 414 页）

按：此段似应标作：“朗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自婚姻中表，礼赞无所受。”

4.《三国志·魏志·高堂隆传》：“帝初践阼，群臣或以为宜飨会，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为不宜为会，帝敬纳之。”（第三册 708 页）

按：此段似应标作：“帝初践阼，群臣或以为宜飨会，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为不宜为会。’帝敬纳之。”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邮编：250100 责任编辑：陈道贵）

《因话录》校勘标点举正

陶 敏

赵璘《因话录》向以史料翔实可靠著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实多可资考证者,在唐人说部之中,犹为善本焉”。此书有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排印本,以《稗海》本为底本,并用《唐语林》等书校勘。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用古典文学出版社原纸型重印,改正了原书一些校点上的错误,但仍遗留了一些漏误可议之处,举正如下:

人名错漏

1. 卷一第69页:“政和公主,肃宗第三女也,降柳潭。”按政和公主乃和政公主之误。《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肃宗七女……和政公主,章敬太后所生……下嫁柳潭。”《唐语林》卷四引《因话录》作“和政”,不误。

2. 卷一第69页“时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下原注:“讳芳,字伯存。”卷二第75页“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下原注:“讳芳,字伯存。”二“芳”字均“并”之误。据《新唐书·柳芳传》,芳字仲敷。《新唐书·柳并传》:“字伯存,大历中,辟河东掌书记,迁殿中侍御史。丧明,终于家。”《唐语林》卷四引《因话录》作“并”,不误。

3. 卷一第73页:“文宗对翰林诸学士,因论前代文章,裴舍人数道陈拾遗名。柳舍人璟目之。”按《唐语林》卷三“裴舍人”下有“素”字。裴素两《唐书》无传。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裴素开成三年十二月入院,四年七月加知制诰,五年六月迁中书舍人;柳璟开成二年七月入院,二(当作三)年四月加驾部郎中知制诰,(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谓此当有“五年”二字)二月九日迁中书舍人。故二人同时为学士。“素”为舍人之名,当补。

4. 卷一第74页载宣宗语:“谏官但要职业修举,亦岂在多。只如张道符、牛业、赵璘辈三数人足矣!”“牛业”,当为“牛丛”之误。《新唐书·牛僧孺传》“诸子蔚、丛最显……丛字表龄,由藩帅幕府任补阙,数言事。会宰相请广谏员,宣宗曰:‘谏臣唯能举职为可,奚用众耶?今张符、赵璘、牛丛使朕闻所未闻,三人足矣。’”即采《因话录》之文。《新传》夺“张道符”之“道”字,则当据《因话录》补。

5. 卷二第76页:“司徒郑真公,每在方镇……”“郑真公”当作“郑贞公”,即郑余庆。引《旧唐书·郑余庆传》载,穆宗即位后,余庆以师傅之旧进位检校司徒,其年卒,谥曰贞。《唐语林》卷六引《因话录》作“贞”,不误。

6. 卷三第82页:“家藏书最多者,苏少常景胤,堂弟尚书涤,诸家无比。”“景胤”当为“景胤”之误。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司封郎中第九行有苏景胤。《册府元龟》卷五五四见“史官司封郎中苏景裔”,为避宋太祖赵匡胤讳改。《唐语林》卷二引《因话录》作“胤”,不误。

7. 卷三第84页:“开成三年,余忝列第……敕头孙河南穀。”“孙穀”当为“孙穀”之误。《登科记考》卷二一引此文,云:“按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云:‘孙穀,会昌三年自左拾遗充翰林学士。’疑‘穀’当作‘穀’。”《唐代墓志汇编》会昌〇一一孙起继夫人《裴氏墓志铭》,“第九侄孙将仕郎、守京兆府鄠县主簿、直弘文馆穀撰”,会昌元年十二月葬。同书大中——〇五四《孙公义墓志》:“次子穀,职参内署,宠渥冠时。天子宠公之归,辍自近侍,除为河南尹。……公顾后无虑,遂告老于朝,当大中三年秋,以工部尚书致仕。是岁仲冬月,有河南意外之丧。”知孙穀大中三年十一月卒河两尹任,故作者呼之为“孙河南”。

8. 卷三第89页:“卢君生既,字子严,清望重器,为世名臣。”“既”为“耽”之误。《新唐书·艺文志二》:“《文宗实录》四十卷。卢耽、蒋偕、王汾、卢告、牛丛撰,魏謩监修。耽字子严,一字子重,历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9. 卷三第90页:“余座主陇西公为台丞,奏令孔尚书温、丞相徐公为监察。”“孔尚书温”;下脱“业”字。《新唐书·李汉传》:“始,汉为中丞,表孔温业为御史。”《因话录》卷六孔温裕条有“堂兄尚书温业”语。

10. 卷四第95页:“卢子严说,早年随其懿亲郑常侍东之同游宣州当涂……”唐无郑东之。《全唐文》卷六九八李德裕有《授狄兼谟兼益王傅郑柬之兼益王府长史制》,“东”当为“柬”之形误。

11. 卷四第97页:“李尚书选,性严毅,不好戏笑。时愿知江西盐铁留后事,将至……”“李尚书选”为“李尚书巽”之误。李巽贞元十三年至永贞元年为江西观察使,见《旧唐书·德宗纪下》;元和初为兵、吏二部尚书,见《旧唐书》本传。《太平广记》卷二五一引《因话录》作“巽”,不误。

12. 卷五第104页:“裴尚书休为谏议大夫……后除舍人。”“裴休”为“裴佖”之误。检两《唐书·裴休传》,休官至宰相,无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之经历。《旧唐书·裴佖

传》：“历驾部、兵部郎中，迁谏议大夫……拜同州刺史，征入为中书舍人……寻迁工部尚书致仕，元和八年卒。”《太平广记》卷二五〇引《因话录》作“佶”，不误。

13. 卷五第107页原注：“近见会补阙实引《礼记·乡饮酒仪》。”“会补阙实”为“惠补阙实”之误。《全唐文》卷八二六黄滔《祭崔补阙道融》“大唐有进士科，无岩穴召，故鹄版之召，不易其人……其后陆君洵以忠勋赴诏，惠君实以忠议赴征。”《全唐诗》卷六〇六林宽《送惠补阙》：“诏下搜岩野。”知惠实自处士诏征，授补阙。

14. 卷六第115页：“刘逸淮在汴时……”“刘逸淮”乃“刘逸准”之误。《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十五年二月“乙丑，以宋州刺史刘逸准检校工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仍赐名全谅”。《旧唐书·刘全谅传》亦作“逸准”。

15. 卷六第120页：“一日，淮南判官杨员外牧自吴中越职，……请遣书崔相国铉。”“杨牧”当为“杨收”之误。《旧唐书·杨收传》：“开成末……收之长安。明年，一举登第……东归，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惊镇扬州，延收署节度推官，奏授校书郎。”崔铉继杜惊为淮南节度使，杨收当继入崔幕为淮南判官。《唐语林》卷七引《因话录》作“杨收”，不误。

地名错误

16. 卷二第76页：“司徒郑真（贞）公……公与其宗叔太子太傅綰俱住招国。”“招国”，为“昭国”之误。《唐两京城坊考》长安有昭国里，无招国里。《新唐书·郑余庆传》：“与从父綰，家昭国坊，綰第在南，余庆第在北，世谓‘南郑相’、‘北郑相’云。”《唐语林》卷六引《因话录》作“昭国”，不误。

17. 卷二第79页：“（李约）在湖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清越。”“湖州”当作“润州”。下文云李约时在浙西李錡幕中。浙西观察使治所在润州。《太平广记》卷二〇一、《唐语林》卷六引《因话录》，均作“润州”，不误。

官称错误。

18. 卷三第90页：“陇西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归朝，而孔、徐二公并时为丞相，每燕集，时人以为盛事。”文中“丞相”当为“丞郎”之误。文中孔、徐二公指孔温业、徐商（参见第9条），据《新唐书·宰相表下》，徐商咸通六年六月至十年六月方为相，孔温业未曾为相。《新唐书·徐商传》：“人中时，擢累尚书左丞。宣宗诏为巡边使，使有指，拜河中节度使。”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列徐商大中五年官尚书左丞。《全唐文》卷七五五杜牧《唐歙州刺史邢君（群）墓志铭》称“今吏部侍郎孔温业”，又称群“大和三年六月卒于东都思恭里”，据群生平，“大和”为“大中”之误，知大中四年左右孔温

业已官吏部侍郎,与徐商官左丞约略同时,故文云‘丞郎’。《唐语林》卷四引《因话录》作“丞郎”,不误。

19. 卷五第103页:“馆驿使之上则监察使。监察使,同僚之冠也,谓之‘院长’。”二“监察使”均为“监祭使”之误。唐无监察使之名目。柳宗元《监祭使厅壁记》“唐《开元礼》: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监视,祠官有不如仪者以闻。其刻印移书,则曰监祭使……旧以监察御史之长居是职。”

20. 卷五第106页:“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右丞相”之“相”字为衍文。王璠大和二年十月自河南尹除尚书右丞,见《旧唐书·文宗纪上》《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引《因话录》,无“相”字。

年号错误

21. 卷六第118页:“子溥又自说……大中元年冬,求解凤翔……至东都,试《缙山月闻王子晋吹笙》诗……明年,果登第焉。”“大中”为“大和”之误。《新唐书·郑熏传》:“字子溥,擢进士第,历考功郎中、翰林学士。出为宣歙观察使。”郑熏大中十年为宣歙观察使,十二年七月,为都将康全泰所逐,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五六。故熏不当为大中二年进士。前文已云:“大和元年秋,移举洛中。”《旧唐书·文宗纪上》“(大和元年七月)敕:今年宜权于东都置举,其明经、进士任便在东都赴集。”故郑熏当于大和元年冬赴举东都,大和二年进士及第。《登科记考》卷二〇即列郑熏为大和二年进士,但误其名为郑溥。大和二年进士试题为《缙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因话录》脱“夜”字。《因话录》此条之末又云:“子溥,郑公之子。”“之子”当为“之字”之误,说见前。

标点错误

22. 卷一第68页载肃宗从玄宗在太清宫见龙事:“上问:‘头在何处?’曰:‘在东上。’抚之曰:‘真我儿也。’”按“东上”之“上”当指皇帝唐玄宗,与“上问”之“上”同,应属下读,作“上抚之曰”。

23. 卷二第87页:“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按《唐六典》卷二:考功郎中“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书其考课等第,即所谓“书考”。《旧五代史·职官志》载后唐清泰二年秋考功上言:“公事官,逐年书考,较其优劣。”故当于“书考”下读断。“书考”对所有官员而言,并非只考核“官之清高者”。

24. 卷四第98页载,举子严生,读《登科记》误本,以庞严为族人,往谒,“久之,语

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事,庞方讶之,因问止竟:“郎君何姓?”“止竟”不成语,当从《太平广记》卷二六一改为“至竟”,属下读。“至竟郎君何姓”犹言“郎君到底姓什么”。

25. 卷五第105页:“韩晋公节制三吴,多历年所取宾佐僚属,随其所长,无不得人。”此误以为“所”为结构助词,“宾佐僚属”多为“历年所取”。实则,此“所”为名词,意为数。《书·君奭》:“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当于“所”下读断。

26. 卷六第115页:“刘逸淮(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二“虞候”均当属上读。唐代军队分左右厢,虞候为军中武职。《新唐书·礼仪志六》载仲冬讲武之礼,“左右厢各为三军”。《旧唐书·李希烈传》:“忠臣兼领汴州,希烈为左厢都虞候。”《旧五代史·庄宗纪》载伐蜀诏:“华州节度使毛璋充行营左厢马步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充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

27. 卷六第117页:“大和元年秋,移举洛中,时韦景方居守,尚书族弟也,赴举过陕。尚书时廉察陕郊,诘景方曰:‘我名弘景……’按“居守”指东都留守,二字当属下读。“居守尚书”即韦弘景。《旧唐书·文宗纪下》:“(大和五年五月)辛酉,东都留守、刑部尚书韦弘景卒。”而韦周方末为“层守”。

条目分合错误

28. 卷六第118页“大中九年沈询”条载万年令李丛席上李蟪为李蟪座主沈询同年,李从晦又与李蟪座同年事,末云:“侍读谏议漳说。”其下条载孔温裕在贬所望敕事。再下条首云:“郑又自说,早承相国武都公知奖……”但此一“郑”字,前无所承,故不知为谁何。但《东观奏记》卷下云:“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谏议大夫郑漳……为郢王已下侍读。”知沈询条之“侍读谏议漳说”之“漳”即郑漳,亦即后“郑又自说”之“郑”,此六字当移于孔温裕条之首。

29. 卷五第108页云:“高宗朝,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后人不名者呼为‘西台’,又不知出何故事,岂以其名上‘栖’字,遂呼之耶?又呼杜门下黄裳。为当致敬,安得辄废?若妖神淫祀,无名而设,苟有识名,固当远之……”“又呼杜门下黄裳”与下文“为当致敬”不相连属,故原书“黄裳”下校云:“案下有阙文。”检《永乐大典》卷二六〇六引《唐语林》“又呼杜门下黄裳”前有“赵璘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八十四字,《永乐大典》卷二九四九引《唐语林》在“杜门下黄裳”下有“余幼曾居山,多疾。亲友受命授道策……”一百二十七字。知本条前半记职官称谓,后半言淫祀非礼,实为两条,因佚去二百余字,遂误合为一条。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 邮编:411201 责任编辑:吴言)

王逸《离骚经章句》语言的抒情风格及相关问题评述

王启敏

王逸《楚辞章句》是现存众多楚辞注本中最早的一种,历来受到楚辞研究家的重视。王逸生活在东汉中期,比较接近屈原生活的时代,“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四库全书总目》)。^①他本人又是楚地出生,《后汉书》王逸传说,“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②屈原《涉江》有“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的句子,洪兴祖补注云:“前汉南郡江陵县,故楚郢都。”^③可见,王逸与屈原二人有着地缘上的关系。《九思序》中王逸也自称与屈原“同土共国”。所以王逸对楚地文化习俗、名物典章应该相对熟悉,他的注解要可靠一些。《离骚》中“非世俗之所服”句下洪兴祖补注亦云:“世所传《楚词》,惟王逸本最古,凡诸本异同,皆当以此为正。”^④关于王逸和他的《楚辞章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王逸注释运用的语言很有特点,他很少使用那些质木无文的纯学术语说话,而是多用“情语”,文字里的感情往往自然的流淌出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抒情风格。我们只要细心的读一读《楚辞章句》,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点。这一风格在《离骚》的注文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很值得作一些研究。下面即以《离骚》的王注为主,谈一谈它语言的抒情风格及与之有关的几个问题,如这种风格的表现特点、表情的语言手段以及这种风格产生的主观因素等。

—

对文字作品本文的解读,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可以看作是一种以书面形式进行的言语交际活动。因此,《离骚经章句》(下简称《章句》)也可看成是王逸与屈原展开的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离骚》中的每一个句子,就是屈原的一句话语;王逸的每一条注文,就是他的一次应答。但这场“对话”是非互动的,双方的地位也不平等,后者只能时刻调整自己的话语来适应前者已形成的语言情境,单方面努力提高这场言语交际的效果。陈望道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境的修饰。”(《修辞学发凡》)^⑤语境学的创始者英国人弗斯,曾在情境

分析的平面上把言语交际参与者的人物、个性及相关特征等看作言语行为的重要特征。从这方面看,屈原的思想、性格、生活经历以及与《离骚》文本相关的内容等都可看成是构成《离骚》情境的因素。就现有材料看,王逸是汉代唯一全面接受屈原的人,他景仰屈原的人格,接受他的思想,伤愍他的遭遇,欣赏楚辞的文采,这些在《章句》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到反映。因此,他在“对话”中能很好的充任角色,大体保证了“交际”的有效性。尤其在感情表达上,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为注解所能达到的抒情功能,适应了《离骚》的“题旨和情境”。因此,尽管《离骚》本文与王逸注解形式上是分离的,但从抒发情感的特征看,二者是相适应的,是紧密关联的。下面对此具体作一些分析。

《离骚》中的主人公心情是矛盾苦闷的,他始终彷徨在现实与理想的歧路上不知所从,“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惜诵》),因而表现的情感是非静止的、非直线型的。“斗争与妥协,自清与随俗,两种不同的处世哲学在他心中交战,使他不得安宁。他的诗总是反复地诉说着、分辨着、表白着,形成他所特有的一种感情旋律。好象交响乐中两个不同主题的对比与反复,终于激起一片波澜壮阔的音响。”(袁行霈《屈原的人格美及其诗歌的艺术美》)^⑥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忽起忽落、忽断忽续的感情急流中,有对自己拥有善道以辅君、训典以治民才能的自信;也有时不我待、“美人迟暮”的惶恐;有对怀王听用谗言、中道变志的伤心和抱怨;有对众芳芜废、博求贤才以匡君立政之梦破灭的痛心和无奈;也有对众小驰骛惊遽、恃宠恣行的无比悲愤;还有身逢危殆,尤不悔而思退的执着……不同的感情之水汨汨滔滔,冲流激荡,“使这首诗呈现了一种既孤傲、又悲怆,既激烈狂放、又坦荡从容的混茫气象。”(潘啸龙《论〈离骚〉的抒情结构及意象表现》)^⑦这种感情上的跳动起伏、往返复沓很能牵动人的心灵,对王逸注释时的情绪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章句》的情感之流的确因之生发着、变动着,呈现出一种流动回旋的状态。单看每条注文的发展词,“屈原言”、“言己”、“言吾”等不断的变换使用,有时则干脆用“言我”,很有代屈原抒情的意思。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等句屈原自述自己精心培育着青年人,《离骚》的情感之流在这里也像是汇入了一个宁静的港湾。“树蕙之百亩”,“杂杜衡与芳芷”,“畦留夷与揭车”,一系列动作让人看出这个憔悴而顽强的长者育才的心情是何等良苦!“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吾将刈”,那种期待青年人早日成材的愿望又是怎样的迫切!这时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在屈原心中难得的淡泊与平静之下,正酝酿着新的情感的波澜。王逸解释说:“虽见放流,犹种蒔众香,修行仁义,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又说:

“积累众善,以自洁饰,复植留夷、杜衡,杂以芳芷,芬香益畅,德行盛也。”“修仁义”、“德行盛”有些迂腐,但单从语言的感情色彩上看则是很合原文的情境的:语气平缓有度,情绪似乎不急不躁,但平静的外表下也暗潮涌动。紧接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表示了对小人争逐权势、追求财利的愤慨,诗人的情感开始变得急切起来,像是一首乐曲由低音转入了高音,并且乐曲中夹杂着“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的浓浓的感伤。王逸注释的语言也大受感染,而且在此感情基础上还作了发挥,他像有点咬牙切齿的说:“在位之人,无有清洁之志,皆并进取,贪婪于财利,中心虽满,尤复求索,不知厌饱也。”语气更强烈,看不出丝毫感伤情绪,更多的是对君任佞巧,竞疾忠信,交乱纷拏的政治状况的愤怒谴责。然后,从“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句起,《离骚》本文的感情又跌入一个低回区,之后又慢慢上扬,到“怨灵修之浩荡兮”等句发展到一个小高潮。王注语言表现出的感情也随之激荡、变动,这时也达到一个高点。但此时屈原对自己履行忠信、执守清白,却不为君王理解,表现的情感是复杂的、有矛盾的。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一句的解释中,洪兴祖《补注》引《孟子》说的“《小弁》之怨,亲亲也”,说:“屈原于怀王,其犹《小弁》之怨乎?”《小雅·小弁》讲的是被父放逐的儿子倾诉自己内心苦痛、表达受到不正当待遇的强烈不满情绪,其中伤痛的成分多一些,怨恨的成分要少一些,以之来比屈原对怀王的“怨”情是恰当的。而王逸在注中表现的情绪还要激烈一些,很有一点声讨的架势:“上政迷乱则下怨,父行悖惑则子恨。”语气是斩钉截铁的。又说:“言己所以怨恨于怀王者,以其用心浩荡,骄傲放恣,无有思虑,终不省察万民善恶之心,故朱紫相乱,国将倾危也。”有点像义正词严的警告语,而且把屈原对君王的“怨”直接解释成“怨恨”,不仅表明了个人的思想情绪,同时我们也看出,在忠信观念上王逸与屈原是有不同处的。

《离骚》本文的感情以悲愤为主色调,并在全文后半部分表现得尤其突出。当屈原纵观古今兴衰成败之迹,想到自己婞直以涉此乱世,于是“就重华而陈辞”,备陈三代之兴衰,自哀生不当举贤之世,只能眷眷独悲:“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悲何以堪。王逸解释说:“言己自伤放在草泽,心悲泣下,沾濡我衣,浪浪而流,犹引取柔粟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失仁义之则也。”言辞之中也充满了志望已讫,不知所之的悲戚。可见,王逸对屈原的这种悲苦最有体悟,这也最能引发他的同情,最能激动他的心灵。他在《九思·遭厄》中将类似的情感直接作了发抒:“思哽噎兮诘咄,涕流澜兮发雨。”悲愤也是《章句》情感发展的主线,构成其抒情风格的主要特点。但《章句》语言中表现的悲愤之情不是孤立的,而是依存于《离骚》本文的,且与《离骚》的情感走